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诗乐行吟

吴相洲 主编

第六辑



学苑出版社

本书得到“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拔尖创新人才”项目经费和211工程建设经费支持 1386981

乐府学
第六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吴相洲 主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86981



尊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乐府学·第6辑 / 吴相洲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77-3723-3

I. ①乐… II. ①吴… III. ①乐府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653 号

出版人: 孟白

责任编辑: 刘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2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1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目 录

[文献考订]

- 从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看《乐府诗集》的编纂 喻意志\1
《乐府诗集》解题材料的类型分析 向回\11
庾信乐府诗和汉画像石“獬豸”文图汇考 黄震云\28

目

[音乐考察]

- 《陌上桑》曲辞辨析 陈利辉\34
论北朝宫廷乐府 赵宏艳\45
从“相和六引”到“相和五引” 曾智安\61
从音乐风格角度看乐府诗的声、辞关系 王昊\74

录

[体制探源]

- 两汉黄门乐新考 杨唯伟\97
唐代教坊四部考 文艳蓉\112
中晚唐教坊演化考 刘洁\120

[名篇论丛]

- 《梅花落》研究（下） 王美凤\133
古称《渌水》今《白纻》 毛小华\172

论韩愈《琴操十首》	杜兴梅 杜运通\186
[文学研究]	
论魏晋隐逸风尚与山水琴歌的关系	周仕慧\201
曹植乐府之“乖调”探微	李成林\215
论张九龄的乐府诗	雷乔英\226
白居易《新乐府》原型之考论	方向明\250
论张祜乐府诗的体式	马婧\259
论张祜乐府诗的复与变	沈希安\276
张正见乐府诗分类研究	刘丹丹\286
[唐后乐府研究]	
吴炎、潘柽章新乐府研究	张煜\292
[研究综述]	
十年汉魏六朝乐府歌辞研究综述	吴大顺\312
英文目录	329

从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看《乐府诗集》的编纂

◇ 喻意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410012)

提要:本文以宋刊《乐府诗集》中的小注为切入点,通过大量校勘,认为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并非简单抄录所据底本,他同时还参考了其他多种文献,并将异文以“一作”的方式加以标注。《乐府诗集》小注除少部分源自所据底本外,大部分则是《乐府诗集》在成书过程中,编者参考其他文献时所标之异文。

关键词:宋本《乐府诗集》 小注 异文 编纂

《乐府诗集》是收录宋前乐府诗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一百卷。如此煌煌巨著何以编成?其编者郭茂倩曾以哪些文献为据?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乐府诗集》宋刊本^①(尤其是歌辞部分)中有许多小注,这些小注是郭茂倩编纂该书时所为吗?带着诸多疑问,笔者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究,认为这些小注产生于《乐府诗集》的成书过程中,而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利用文献的一些情况。特撰成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的概况

关于《乐府诗集》的编纂,我们应了解如下事实: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某类或某首歌辞时,往往有多种文献可参。如晋郊庙歌辞部分就有《宋书·乐志》、《晋书·乐志》可供参考,又如舞曲歌辞

^①此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北京图书馆藏傅增湘本。

《拂舞歌》部分则可同时参考《宋书·乐志》、《晋书·乐志》和《南齐书·乐志》。至于每一部类所录作家诗作则可参文献更多，如作家之别集、总集及其不同版本。郭茂倩编纂之时，往往在众多参考用书中确定一种或多种作为底本，并随手抄录其他文献的异文。这一现象在《乐府诗集》题解中即可见到。如卷三九《艳歌何尝行》题解云：

《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言雌病，雄不能负之而去，‘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虽遇新相知，终伤生别离也。又有古辞云‘何尝快，独无忧’，不复为后人所拟。”鹄，一作鹤。

按：“鹄，一作鹤”乃郭氏编纂时所录异文。据校勘，今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鹄”即作“鹤”。又《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古诗》、《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歌辞》亦作“鹤”。另外，琴曲歌辞卷五八韩愈《别鹤操》又作“《别鹄操》”。

卷八三宁戚《商歌二首》题解：

《淮南子》曰：“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曰：‘异哉，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越，一作戚。

按：“越，一作戚”亦是郭氏所录异文。据校勘：丛刊本《淮南子》卷十二与《乐府诗集》同，作“宁越”。然其他如《吕氏春秋》卷一九、《史记》卷八三、《后汉书》卷六十上、《艺文类聚》卷九四等皆作“宁戚”。又如卷五四《独漉篇》题解云：“‘独漉’，一作‘独禄’。”按《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晋书·乐志》皆作“独禄”。

以上情况表明：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并非简单抄录所据底本，他同时还参考了其他多种文献，并将异文加以标注。这一现象在作品部分很普遍。据笔者统计，《乐府诗集》作品部分约450首乐府诗作

中有小注，共计 760 余处。^①其中无名氏之作和标为“古辞”的作品 26 首，小注 45 处；姓名可明确之作家共 124 人，作品 423 首，小注 710 余处。日本学者增田清秀在《乐府の歴史的研究》中统计《乐府诗集》共收 5290 首作品。其中姓名可明确之作者 576 人，作品 3793 首，占全部作品总数的 72%；无主名作品 1497 首。其中以“古辞”为名的作品共 56 首。两相比较可见，作家作品中有小注的比例比无主名作品中有小注的比例要高得多（前者约占全部有主名作品的 11%，后者则约占全部无主名作品的 2%）。这一统计说明：因作家作品不仅收录于总集中，且有别集传世，可用于参校的版本多，故异文也多；相反，无主名作品绝大部分仅收录于如《古乐府》、《古今乐录》等总集或乐书中，可用于参校的文献相对较少，故异文也少。这为我们前面的判断亦提供了一个旁证。

《乐府诗集》小注绝大部分以“一作”的形式出现。但这些小注是否皆为郭茂倩编纂时参考其他文献所标异文呢？笔者将一部分有小注的相关作品与其他文献进行了详细比勘，^②大致看来，这些小注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小注肯定源自编纂时所用底本。如卷十六《朱鹭》及《思悲翁》古辞小注，^③即本自《宋书·乐志》。卷六武后《唐大享拜洛乐章》

① 说明：1. 此“450 首”系以同一曲调下的作品为单元来计算的。若某一曲调或该曲调的某一作家下有多首作品有小注，则仍算作一首。如卷四四“秋歌十八首”中虽有三首有小注，但仍只算作一首，余同；2. 明显不是异文的小注并不纳入；3. 卷二七—三四系据影宋写本配补，其部分小注乃抄者参校元刊本之校语，非宋本所有，亦不纳入。

② 笔者首选诗作中小注较多的作家作品，版本则首选今存宋刊本者：正史皆用百衲本；《李太白文集》，宋蜀本（因条件限制，代以詹锳主编之《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元氏长庆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钞宋本；《白氏长庆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绍兴本，又四部丛刊影日本那波道圆覆宋大字本；《李贺歌诗编》，四部丛刊影宋理宗宝祐四年刊本；《温庭筠诗集》，四部丛刊影钱遵王精抄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影宋本；《刘梦得文集》，四部丛刊影覆宋蜀刻本；《王建诗集》，中华书局排印本（以南宋书棚本为底本）；《鲍氏集》，四部丛刊影毛扆校宋本；《谢宣城诗集》，四部丛刊影明钞本（源出宋本）；《孟东野诗集》，四部丛刊影明刊本；《六臣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宋本；《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影尤刻本；《玉台新咏》，文学古籍刊行社影明赵均小宛堂覆宋陈玉父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百衲本。

③ 若非特意注明小注内容，则此“小注”皆指以“一作某”形式出现者，下同。

之《咸和》中小注“下一句逸”，卷十《唐享太庙乐章》之《崇德舞》小注“后为图开”，皆本自《旧唐书·音乐志》。^①

二、《乐府诗集》中的小注与相对应的别集或总集的正文相同。这一情况较多。如《乐府诗集》所录白居易、温庭筠、元稹等人诗作中的小注大多与今存别集的正文一致，或者亦与《文苑英华》的正文或其小注一致。^②

三、相对应的别集或总集的正文与《乐府诗集》中小注所属正文相同，但其后未有小注。这一情况也较多。如李贺、鲍照等人的诗作。

四、《乐府诗集》中的正文和小注与相对应别集的正文和小注相同，这一情况多见于李白诗作中。另外如卷七七孟郊《乐府》的小注即是孟集中原有，而卷一百温庭筠《湘东宴曲》小注亦本集原有。

五、《乐府诗集》中的正文和小注与相对应别集的正文和小注正好相反，这一情况较少见。就目前来看，李白诗作中有小部分。如卷五一《凤台曲》、卷五九《秋思》、卷六三《白马篇》等。

除上述五种情况外，尚有部分有小注的作品因系“晋宋梁辞”或为无主名的近代曲辞，今未有相关参校文献，如卷四四《子夜歌》、《春歌》、《秋歌》、《冬歌》，卷四五《上声歌》、《前溪歌》、《长史变歌》，卷七九《水调》、《大和》、《陆州歌》等。它们或为底本中即有，或为与其他总集及其不同版本（如《古乐府》、《历代歌辞》等）相校之异文。此外，亦有相当一部分有主名之作因无宋刊本传世或无别集流传（汉魏六朝作家多如是），故并未校勘而无从得知详情。

① 目前，能断定作品部分数据来源的只有郊庙、燕射二类歌辞，除少数可能自别集以外，其余绝大部分源于正史乐志。而正史乐志所录郊庙、燕射歌辞部分版本单一，郭氏基本未参其他文献。

② 因现存宋刊别集不多，而《文苑英华》编成于宋代，多以当时存见之总集、别集为底本或参校文献，故本文亦将之纳入。就比勘结果来看，《乐府诗集》中小注与《文苑英华》中正文或小注相同者很多。这其实表明《乐府诗集》中小注与宋刊本的一致性。另外，汉魏六朝时的作家诗作，因今存宋刊本极少，故除鲍照、江淹、谢朓等人外，大部分并未以其别集校勘，而是采用《文选》、《玉台新咏》、《文苑英华》等文献。

二、关于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的性质

从前文分析可见，《乐府诗集》小注除小部分源自所据底本外，大部分则是《乐府诗集》在成书过程中，参考其他文献时所标之异文。作此判断尚有如下证据：

其一，《乐府诗集》卷二五《木兰诗》古辞中小注乃参考其他文献所标之异文。

《木兰诗》古辞“愿驰千里足”句下小注：“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愿借明驼千里足’”。按段成式卒于唐咸通四年（863），主要生活于中、晚唐时期。郭茂倩若以《古今乐录》为底本，则此小注定非智匠所为；若以《古乐府》为底本，则吴兢亦不可能见到段氏《酉阳杂俎》。而成书于绍兴六年（1136）的曾慥《类说》收录《古乐府》之《木兰诗》即无小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杜牧之”条引及《古乐府·木兰篇》此一诗句，云：

洪驹父《诗话》云：“《古乐府·木兰篇》‘愿驰千里明驼足，千里送儿还故乡’。”苕溪渔隐曰：余读《古乐府·木兰篇》云：“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止此而已，驹父乃云如此，疑其误也。

胡仔所云及该书所引洪驹父《诗话》（又见《能改斋漫录》卷七“明驼”条引）皆未见有关“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小注。另外，《宾退录》卷一云：

古乐府《木兰词》，文字奇古，然其间有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亦未有《酉阳杂俎》之语。可见，这一小注乃《乐府诗集》成书过程中郭茂倩或他人所为，亦即此小注产生于《乐府诗集》成书过程中，而非录自所据底本。与之相同，前述第二种小注情况——《乐府诗集》“一作某”注与诗人别集或总集中的正文相同——也是《乐府诗集》在成书过程中曾参以大量文献之力证。

其二，以《乐府诗集》所收李白诗作为例，其中小注多为以其他

文献参校时所标之异文。

《乐府诗集》收录作家作品最多的是李白的诗作，共 159 首。^①其中有小注的作品 56 首（依曲调为单元），小注达 118 处，约占全部作品小注的七分之一强，也是《乐府》所收作品中小注最多的作家诗作。另外，李白别集版本很多且很复杂，今又有两种宋刊本存世。故以之为特例加以考察。

据研究，^②现存宋刊李白集有两种：一种是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刻于南宋高宗（1127—1162）时，是今传最早的李白诗文集。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原缺十卷，以清缪曰芑影宋本配补）、清缪曰芑影宋《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三本源自同一刻版。另一种是宋咸淳本，但咸淳年间（1265—1274）之原刻本今已不存，存者为明鲍松编正德八年（1513）所刻《李杜全集》中的《李翰林集》三十卷本，是影宋咸淳本。

宋蜀本据元丰年间晏知止（字处善）刻本翻刻而成。晏刻本则是宋敏求在乐史所编二十卷本《李翰林集》的基础上增订的，后曾巩又在其分类的基础上依诗歌创作之先后顺序加以排列。之后，这个经宋敏求增广曾巩考次的本子于元丰三年（1080）由苏州太守晏知止付诸刊刻，即所谓苏本，或晏处善本。该本“一作”注很多，即是宋敏求在收集各种传抄本编辑时，所保存的自李阳冰以来各家传本之异文，反映了李白诗文从唐朝到北宋前期流传的面目。今存咸淳本并非本自晏处善本，而是从周必大所见“当涂本”翻刻的。该本所收作品较宋蜀本所收有所减少，且分类不一致。因未经曾巩考次，每类中诗题之排列顺序除古风、乐府大体一致外，其余各类与宋蜀本出入很大。此本列入“一作”的异文，亦比宋蜀本少了许多。但可肯定该本参考过宋蜀本。

介绍此二种宋刊李白文集，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具体比勘，以考察《乐府诗集》收录李白诗作时所用底本及其参考文献的情况。笔者以郭氏所收有小注的 56 首作品为对象，将之与宋蜀本、咸淳本进行比勘，^③

① 据增田清秀的统计，见《乐府の歴史的研究》。

② 参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③ 因条件限制，此二宋本笔者皆未经眼。而代之以《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本以日本静嘉堂藏宋蜀本为底本，校以咸淳本等他本。

发现郭氏收录李白乐府诗作时曾参考多种文献。今以卷四十李白《蜀道难》为例加以说明。此诗有 9 处小注，其与宋蜀本、咸淳本相应文字校勘之结果为：（一）6 处《乐府》正文、小注全同宋蜀本。其中有 4 处咸淳本下无小注；1 处咸淳本无小注，然其正文同《乐府》小注；1 处咸淳本小注同《乐府》正文，然正文却不同于《乐府》小注。（二）2 处《乐府》小注同宋蜀本正文，然宋蜀本无小注。而此二处咸淳本之正文、小注与《乐府》相反。（三）1 处《乐府》正文、小注与宋蜀本相反。而咸淳本正文同《乐府》小注，然其小注却不同于《乐府》之正文。除此 9 处外，三者之异文尚有 10 处之多。其中有二宋本有小注，而《乐府》无者；有二宋本正文异，而《乐府》并未标注者，等等。其实，上述情况不仅仅反映在《蜀道难》中。其他诗作中亦如此。如《乐府》卷一《天马歌》仅 1 处小注，而宋蜀本有 4 处，咸淳本 2 处。《乐府》中小注，宋蜀本无，然其正文同《乐府》注文；咸淳本则正文、小注与《乐府》相反，又有一处小注为其所独有。又如卷二八《日出行》中 1 处小注，其正文、注文全同宋蜀本；然咸淳本则无小注，却别有 2 处小注为《乐府》及宋蜀本所无。其中 1 处正文同《乐府》，然小注则同宋蜀本。卷四八《大堤曲》1 处小注，其正文、注文全同宋蜀本；然咸淳本则无小注，而别有 1 处小注之正文同宋蜀本，小注则同《乐府》。至于此三首诗作之全文，则其三者之间皆有异文。

综合看来，《乐府诗集》所录有小注的李白诗作有如下特点：（一）就正文而言，《乐府》所录与二宋本皆有较大差异。（二）就有小注的部分而言，《乐府》大部分正文及其“一作”注与宋蜀本同，而咸淳本则多无“一作”注；但其中，二宋本亦多有“一作”注《乐府》未录；而《乐府》亦有不少“一作”注，二宋本未有。

由上可见，郭茂倩据以编录李白乐府诗作之底本是不同于宋蜀本和咸淳本的其他版本。但其肯定参考了宋蜀本之祖本——晏处善元丰年间刻本。这不仅因为从时间上来说郭氏可以见到该本；同时因为从校勘中亦可见此二者之渊源关系。大致说来，郭茂倩编录李白乐府诗作时，至少参考了两种以上李白诗文集或录其作品之总集。以晏刻本而言，郭氏以之为参考时，系有选择地抄录其“一作某”异文。有时以之为参校，有时亦可能以之为底本。与此同时，郭氏还参考了其他文献，如咸淳本系统的李白文集等。

其三，《乐府诗集》小注的分布与其可参文献之数量基本成正比。

(一) 小注在《乐府诗集》各部类中的分布，间接表明了该类作品在编纂过程中参考文献之概况。

大体说来，拟作多的部类小注亦多，即所参文献多；反之亦然。如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大部分为后人拟作，二者皆十八卷，前者小注194处，后者达206处。相同的情况亦见于同一部类的作品之中。如舞曲歌辞五卷，卷五二的雅舞歌辞部分无小注，其以正史乐志为主要依据，参考文献单一；又无拟作。而杂舞歌辞部分则随着同一曲调后所录拟作的增多，小注亦相应增多。自卷五三至卷五五，各卷小注的数量分别为2、3、16、15处，且多出现于李白、李贺、鲍照、王融等人的作品中。另外，清商曲辞八卷中唯卷四九无小注。据分析可见：此卷所录大多为无名氏之作，其曲调之题解几乎全本《古今乐录》（歌辞盖亦源于此，当无他本可参），加上拟作仅四首，故无小注。

(二) 正史版本单一，而《乐府诗集》据正史收录的歌辞基本无小注。

《乐府诗集》十二部类中，以正史为主要资料来源的有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之雅舞部分和杂歌谣辞。前三类主要源于正史乐志部分，^①后一类则主要源于正史五行志及列传部分。

此四类歌辞之共同特点是：本自正史的歌辞除杂歌谣辞卷八五之《陇上歌》一首以外，余皆无小注。^②如郊庙、燕射二类歌辞共十五卷，

^① 据统计，郊庙歌辞除卷一汉郊祀歌之拟作《灵芝歌》古辞及李白《天马歌》、张仲素《天马辞》，卷六《唐祀九宫贵神乐章》，包括《唐祀风师乐章》及《唐祀雨师乐章》，卷七于邵《唐释奠武成王乐章》、《梁郊祀乐章》、《周郊祀乐章》外，余皆录自正史乐志。燕射歌辞除卷十四萧子云《介雅》三首、《需雅》八首、《雍雅》三首，卷十五庾信《宫调曲》五首以及《晋朝飨乐章》（五代后晋）外，余皆录自正史乐志。卷五二雅舞歌辞除《晋昭德成功舞歌》外，余亦皆录自正史乐志。其中有四曲属五代时郊庙歌辞，然《旧五代史·乐志》未载。按《旧五代史》一书原佚，今本系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实非郭氏所据本之原貌，故难断定此四曲非本自正史乐志。

^② 按《陇上歌》引《晋书·刘曜载记》为题解，其歌辞全同之，且与《太平御览》卷二八〇引《晋书载记》同。正文“陇上壮士有陈安”，“壮士”下注“一作陇上健儿”。按注文与《艺文类聚》卷一九、《御览》卷三五三、四六五所引《赵书》同。又同《乐府诗集·陇上歌》之后李白拟作《司马将军歌》题解“《司马将军歌》，李白所作，以代陇上健儿陈安”（郭氏题解本自李白此作之题注）。

有小注者仅 4 处,^①其中两处乃郭氏所据《旧唐志》中原有（已见前文）。另两处一见郊庙歌辞卷一李白《天马歌》，一见燕射歌辞卷十五庾信《宫调曲五首》。二者皆非本自正史乐志。^②舞曲歌辞雅舞部分无小注。杂歌谣辞七卷，有小注者仅 11 处，其中 10 处皆见后人拟作之中。这一情况表明，因正史多系官府所刊，版本较单一，可参之本少。另外，就郊庙、燕射和雅舞歌辞而言，其一部分歌辞虽可参多种正史乐志（如《宋志》、《晋志》、《南齐志》等）或诗人别集，但盖因三者属宫廷礼乐范畴，郭氏为存其原貌，故只取最合理的一种为底本（如晋郊庙歌辞即本《晋志》所录），并不参校其他史志；至于亦有别集可参者，则皆以正史乐志为据，并不以别集参校。但若此歌辞非本正史乐志，而是录自别集或其他文献，则以他种文献参考，并有异文标注。理由如下：

《乐府诗集》郊庙、燕射歌辞收庾信诗作较多：郊庙歌辞卷四收其《周祀五帝歌十二首》、《周祀方泽歌四首》、《周祀圆丘歌十二首》，卷九收其《周大祫歌二首》、《周宗庙歌十二首》，燕射歌辞卷十五收其《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其中，郊庙歌辞所收诗作皆见《隋书·音乐志》，其本集卷七亦收之。今以庾信本集（丛刊影《庚子山集》）与郭氏所录校勘，二者多有异文，但郭氏并未出注；又以《隋志》所录与《乐府诗集》校勘，则几全同之。由此可见，郭氏编纂此二类歌辞确以正史乐志为本，即使所录诗作亦见于别集，但并不以之参校。^③与之相反，燕

^① 实有五处。郊庙歌辞卷二谢超宗《齐明堂乐歌》之《赤帝歌》末有“下逸”二字小注。今检《南齐志》、《宋志》皆无之。从校勘中可见，郭氏所录歌辞顺序虽与《南齐志》异，然实本之。理由如下：1. 二者异文较少。2. 其前谢超宗《齐南郊乐歌》（中有一首王俭辞）及《齐北郊乐歌》所录歌辞之序皆全同《南齐志》。3. 郭氏所录齐南郊、北郊、明堂三组乐歌之序亦全同之。4. 郭氏所录《齐明堂乐歌》的歌辞顺序同其题解所叙仪式顺序，这是郭氏编纂时所作的改造。因此，此小注系郭氏之误，或其所据《南齐志》确有小注，抑或其他原因。因无其他材料参考，只能存疑。

^② 据校勘，李白《天马歌》中小注与宋蜀本本集正文同。而庾信《宫调曲五首》中小注亦与丛刊本本集正文同。二者后皆无“一作”注。

^③ 这一判断尚有谢朓诗作为证。《乐府诗集》卷三录谢朓《齐雪祭歌八首》，此同见于《南齐志》及其本集。但比勘三者所录，则可见郭氏所录与本集异文多，却几全同于《南齐志》。而更重要的证据则是本集《齐雪祭歌》每一首歌辞后皆有“右某某歌□章，章□句，句□言”（按：□代表数字），但郭氏收录时却未以“章”为歌辞单位，而是从《南齐志》作“解”，且歌辞标题亦从《南齐志》作“歌某某”，而非如本集之“某某歌”。

射歌辞中庾信《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正史乐志不载，郭氏乃据本集收入，其“一作”注1处，即同今本庾集之正文。而卷一所收李白《天马歌》亦如此（其注文同宋蜀本正文，且宋蜀本无小注）。

总而言之，从以上分析可作如下判断：一、《乐府诗集》中的小注除一小部分本自其所据底本外，其余皆产生于其成书过程之中。今存宋本《乐府诗集》刊刻于北宋末而最终印成于南宋初，^①亦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二、郭茂倩在编纂《乐府诗集》时，广校文集歌辞，将所参文献之异文以小注加以标注。其题解中“一作某”注亦是明证。^②

作者简介：喻意志，女，1975年生，湖南平江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音乐史、音乐文献学、音乐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宋本乐府诗集跋”。

② 据笔者研究，郭茂倩《乐府诗集》编纂于北宋后期，此书编成后不久当付刊刻，而刊刻时不可能有人再校以如此繁多的版本另行出注。

《乐府诗集》解题材料的类型分析

◇ 向回

(石家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050051)

提要:《乐府诗集》解题保存了大量的乐曲本事材料,是郭茂倩对乐府诗进行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乐府诗集》解题中的材料进行过类型分析。本文结合实例认为,郭茂倩或援引前人的直接记载,或采用文人诗歌及其序、注、引与整理者所撰说明,或自行勾稽史料以撰写解题,来对乐曲本事进行大致的叙述,以让人从中获得对乐曲本义的理解。

关键词:本事 《乐府诗集》 解题 文献处理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100卷,共收作品5000余首,分作12大类,并撰写解题923处。^①在这些解题中,郭茂倩引书168种,^②于可见文献中勾稽史料,来说明此曲的源起、传播、流变等本事方面的信息,或者通过始辞的分析来考究曲调的本义以及文人拟作对始辞本义的离

① 此处统计数字取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中的说法。不过,对《乐府诗集》曲调及解题数量的统计是一项很难着手的工作。首先,就曲调而言,雅乐中的作品很难以曲调来统计,因为它们往往都是一组乐曲,而且历代沿用与变动情况亦使它们很难以具体的曲调名来统领。同时,很多曲调都有其衍生之题,就题名而言,它们看似不同曲调,但实际上却不宜作为独立的曲调来与其他曲调等同。其次,就解题而言,数量统计往往只能限定于歌辞前有解题者而做,但实际上对某些组曲而言,一个解题往往涉及了该组乐曲中的所有曲调,而像《薤露》与《蒿里》、《长歌行》与《短歌行》、《日重光行》与《月重轮行》这样两两相关的曲调,郭茂倩虽只在前一曲题下撰有解题,但实际上对两个曲调都有涉及。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不打算多做探讨。

② 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第二章专门考察了《乐府诗集》编纂的文献背景,其“《乐府诗集》引书分析”一节统计出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共引书168种,再加上卷二十五横吹曲辞《木兰诗》古辞小注中以出校异文的方式引用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材料,《乐府诗集》中的引书总量共达169种。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乐府诗集〉之研究》一书收集了大量有关《乐府诗集》的资料,其中“《乐府诗集》引用书考”统计出《乐府诗集》解题部分的引书共达163种。

合情况。浏览典籍可以发现，历代正史及政书乐志（礼乐志），文人所撰解题类著作或乐类笔记，文人诗歌及其序、注、引，再加上一些杂记类文献，往往都有乐府诗本事的明确记录。那么，郭茂倩撰写解题时对这些本事文献是如何处理的？除了这些明确的文献记载之外，郭茂倩是否还采用了其他的一些材料？经过分析，本文认为郭茂倩解题所引材料按其性质的不同大略可分作三种类型。

一、援引前人的直接记载

在记录有乐府诗本事的历代文献中，有许多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一种解题性质的叙说方式，即先提及曲调名，继而直述其本事，如正史乐志、解题类著作、各种乐类笔记以及崔豹《古今注》这样的解说诠释型著作等。对这些文献中提及的曲调本事，郭茂倩在撰写解题时便往往直接援引。如《钓竿》、《箜篌引》、《上留田行》、《日重光行》、《别鹤操》、《走马引》、《吴趋行》、《武溪深》诸曲，郭茂倩直接援引晋崔豹《古今注》对其创调本事的记载；《前溪歌》、《丁督护歌》、《长史变歌》诸曲，郭茂倩直接援引沈约《宋书·乐志》对其创调本事的记载；《上声歌》、《华山畿》、《江南弄》、《寿阳乐》、《西乌夜飞》、《上云乐》诸曲，郭茂倩则援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对其创调本事的记载。

有些曲调的创调本事，不同典籍所持的说法不同，这样的情况郭茂倩往往诸说并存。如《雉朝飞》一曲，西汉扬雄《琴清英》中记作卫女傅母作，晋崔豹《古今注》谓其为齐宣王时处士犊沐子所作；《读曲歌》一曲，《宋书·乐志》谓其是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古今乐录》则云“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①《阿子歌》一曲，《宋书·乐志》认为它缘于晋穆帝升平初民间歌谣“阿子汝闻不”之声，而《乐苑》则认为是“嘉兴人养鸭儿，鸭儿既死，因有此歌”。^②同一曲调，其本事之说法迥异如此，而郭茂倩在解题中对这些不同说法均作了援引。

还有一些曲调的解题中郭茂倩虽也援引诸家说法，但这些诸家说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46卷，第1222、1223页，影宋本，台北，世界书局，1967。

②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45卷，第1207页，影宋本，台北，世界书局，1967。